

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第九卷第一期
2010年12月 頁237-243

書評

書名：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to Women's New Roles.

出版：2009,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著者：Gøsta Esping-Andersen

革命尙未成功？評《未完成的革命》

黃志隆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sping-Andersen自1990年以來，陸續發表了三本專書，分別是《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1990）、《後工業經濟的社會基礎》（1999），以及我們在本文所要評論的《未完成的革命》（2009）（以下簡稱《未書》）。《未書》主要共分為五章，而這五章可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挑戰」與第二部分的「福利國家的調適」。第一部分包括了為兩章，分別是第一章的〈家庭與女性角色的革命〉，以及第二章的〈新不平等〉。作者從John Rawls的正義原則出發，分析社會變遷所造成的福利國家制度運作危機：第一是任何效能的取得不能以更不平等為代價；第二，必須對處於最不利地位的人提供最大限度保障，才能稱為重分配的最佳狀態。首先在第一章，Esping-Andersen探討出現在西方先進福利國家的社會結構變遷，特別是隨著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進而參與支薪就業活動的同時，可能會對家戶收入、婚姻，以及家戶構成形式產生的影響。第二章則是探討隨著女性角色的革命性轉變和知識經濟的成熟，進而造成的新興社會不平等現象——特別是收入不平等的惡化、工作富有和工作貧窮家戶間的極化、傳統弱勢團體風險的提高，以及親職在兒童投資上的不足。

如果說第一部分是西方福利國家社會結構變遷現象的描述，則第二部分是Esping-Andersen對該現象可能因應方案的探討，他將其稱之為福利國家的調適策略。這部分共有三章：第三章是〈調整家庭政策以因應女性革命〉，第四章是〈兒童投資與生活機會的平衡〉，第五章則是〈老化與公平〉。在第三章，作者針對日益惡化的少子女現象提出診斷。伴隨著女性就業活動參與的提高，作者認為傳統的家庭政策已無法滿足家庭對照顧的需求，從而引發了少子女化的危機。而可能的解決方案則是透過去家庭化——家務勞動市場化的方式，以極大化家庭的照顧能力，進而緩解日益惡化的少子女化問題。而在第四章，作者則指出了



代表兒童的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策略。作者認為，既有的福利國家制度已無法確保兒童未來發展機會的提升。而解決的方法則是強化對兒童教育的投資，以協助兒童提升未來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最後在第五章，作者則談論到對既有老年收入安全制度的改革，特別是世代間的收入保障與負擔的不平等問題。作者應用「固定比例分擔」（fixed proportional shares）原則，以及延長退休年限等作法，以作為既有老年收入安全制度未來可能的改革方向。透過不同比例的公共年金、私人年金，以及個人帳戶的混合，配合就業年限的延長，Esping-Andersen認為將有助於解決未來老年經濟安全的危機。

我們應如何理解Esping-Andersen在本書中的思考邏輯呢？事實上，他並不諱言自己是個務實的社會民主主義者（Esping-Andersen, 2000）。就如同第一本著作《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的標題一般，如何在資本主義運作的世界中，既能夠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又能使成長的果實為全民所共享，是他一直以來思考的重心。而西方福利國家的後工業化結構轉型，不僅使得經濟成長陷入停滯，連帶的亦造成失業問題的惡化與福利國家的危機。是故，在第二本著作《後工業經濟的社會基礎》中，作者即著重於服務業就業機會的創造，特別是去家庭化的策略，以極大化就業機會的供給，進而使就業和福利之間能夠重新回到平衡狀態。

上述的主張在Esping-Andersen的第三本著作《未完成的革命》中獲得進一步的延伸。該書除仍延續過去以來對西方先進國家福利體制的比較外，更致力於回應福利國家近年來因社會結構變遷所造成的危機：它們包括了出生人口的減少，對兒童的投資太少，以及人口結構的日益老化。而不完整的女性角色革命，被Esping-Andersen視為是傳統福利國家制度必須調整的主要原因。舊有的性別規範，一方面女性社會經濟地位



得以提高，但卻往往只侷限於受過高教育程度，且在職場擔任全職工作的女性。中低教育程度的女性雖亦獲得大量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但多是以非典型就業為主的機會。這種現象不僅造成女性仍難以擺脫家庭照顧者的工作，連帶亦因懼怕中斷就業的風險，造成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甚至是家戶對子女教育投資的不足。而其不僅會形成家戶不平等擴大的新興風險，連帶的亦造成福利國家未來就業人口的不足，子女就業能力水平的低下，甚至是未來老年收入安全的風險。故作者提出的因應方案，主要是訴諸於「男性生命歷程的女性化」、「增加兒童投資」，以及「世代契約的重構」。

Esping-Andersen的回應方式，乍看之下和經濟學主張的人力資本論極為相似，但卻在意義上有根本的差異。傳統由新古典經濟學家（一如作者在該書中大量引用的經濟學家Gary Becker的著作）所提出的人力資本論，指的是個人在教育上的投資。投資愈大，人力資本即可提高，連帶的使個人學識與勞動市場需求相關的技術得到提升，進而獲得較高的報酬。換言之，該理論強調的是個人與家戶對教育的投資。而作者在該書中，則提出了有別於人力資本論的社會資本投資觀點。配合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觀察，作者認為人力資本的投資不能只是個人的責任，還必須是福利國家的責任。面對少子女化海嘯的來襲，未來就業人口的不足勢必無法因應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故藉由去家庭化以強化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意願與能力、藉由增加對兒童幼年時間的教育投資，以及透過世代契約的調整，增強個人對老年收入安全的責任，都被Esping-Andersen視為是福利國家因應未來挑戰的必要調整措施。

然而Esping-Andersen基於社會投資觀點所作出的分析，本文以為仍有兩點值得作更進一步的反思。首先，就業與福利的關係是否仍應被視為是不可斷裂的？對Esping-Andersen而言，後工業社會結構的轉變，使



得西方以工業製造業為主的大量生產體制大幅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以服務業為主的知識經濟運作。面對就業機會成長停滯的結構，他仍認為教育是最好的投資，也是確保未來就業的有效手段。然而隨著各國失業率的居高不下，以及非典型就業比例的大幅攀升，使得近年來有關教育和就業之間的因果關係遭受到極大的挑戰。

另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則是就業和性別平等的關係。女性未完成的革命一書，相當程度是建構在女性從家務勞動中擺脫，進而參與勞動市場就業的假設上。Esping-Andersen將中低階婦女自家務照顧工作的解放，視為是革命的最終目標。他試圖透過女性生命歷程的男性化，解決家戶之間因知識經濟與後工業轉型而日益升高的階級不平等問題。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變遷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愈來愈多的女性外籍移工跨越國界，被高薪的雙薪家庭所僱用。簡言之，家務照顧工作市場化，雖創造了服務業的就業機會，但往往難以避免由其他開發中國家的中低階婦女承接低薪的家庭照顧工作，形成以鄰為壑的剝削現象與移工商品化問題。這種「革命性」的轉變，事實上已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除此之外，去家庭化下的家庭人際關係異化，對於家庭制度的衝擊，是否將進一步的擴大，值得我們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上述的問題並不構成《未書》的缺陷，但卻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就業和福利關係，應如何在經濟全球化與後工業社會結構轉型中重構。就教育而言，我們是否仍應以單一且線性的生命歷程，來看待教育——就業——退休的三階段轉銜？就性別平等而言，家務照顧工作的市場化亦或是去家庭化，是減低亦或是強化既有的性別不平等？而從更鉅觀的角度來檢視，Esping-Andersen在該書中，雖然回應了女性主義者長期以來挑戰的性別不平等（性別盲），並將論證的主戰場拉回階級不平等（家戶所得差異的擴大）與世代間的不平等（人口結構的老化），但卻忽略



了在消失的國界中日益惡化的種族不平等問題。而這無疑的，仍將是我們在閱讀完該書後，必須持續關注與研究的主題。



參考文獻

- Becker, G.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østa (2000). Multi-dimentional Decommodification: A Reply to Graham Room. *Policy & Politics*, 28(3), 353-359.
- Esping-Andersen, Gøsta (2009).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to Women's New Rol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